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三辑

主编 ◇ 滕星

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 文字使用发展研究

宝乐日◎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二期重点建设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
项目编号：cun985—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
项目批准号：05JJD850139

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 使用发展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1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3辑)

ISBN 978 - 7 - 105 - 11340 - 8

I. ①土… II. ①宝… III. ①土族语—研究②羌族—研究
IV. ①H231②H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3015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张 华

封面设计: 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9 千字

印 张: 10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340 - 8/H · 772(汉 23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主编序言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遗产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是由人类学与教育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

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调查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似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一门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

文化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 20 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 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仅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的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和社会学都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但人类学却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性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

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主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贵州苗族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种族与国民性》(N. Ken Shimahara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

本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劳凯声教授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

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社区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人类学和教育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滕 星

2009年12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序 言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或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它吸收了包括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先进的研究成果。在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萌芽于 17 世纪,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主要包括以英美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和以欧洲的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我国的教育人类学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呈现出发展态势,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试图建构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出版了一批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与此同时,我国教育人类学的教学科研机构 and 人才培养模式也逐渐完善,学术队伍日益壮大。

过去的 30 年是我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间,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基本完成,科学实践与学术化并重,努力树立了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其主要成就包括:首先,结合研究生教学实践,与研究生一起初步翻译了二十余部有代表性的西方教育人类学著作作为研究生教学使用的内部教材,同时,相继编写了带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对象的教育人类学的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与《民族教育学通论》;其

次是开展持续性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云南中缅边境的拉祜族地区、新疆南部的和田维吾尔族地区建立了较固定的田野工作点，并组织撰写出大量相应的田野研究报告；另外，加大学科建设和学术梯队建设力度，率先在中央民族大学建立民族教育研究所，完善了本、硕、博三级培养教育人类学人才的教学体系，为该领域的学科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组织机构和师资基础。同时，积极创办了该领域第一个专业学术期刊——《民族教育研究》，并出版了《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即《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族群、文化与教育》、《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

《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一书，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优秀成果之一。作者宝乐日是我的博士生，来自内蒙古，蒙古族。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了由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的调研工作，并承担了子课题“土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羌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的田野调研工作。她勤奋好学，吃苦耐劳。面对陌生的调查环境，不畏艰辛，努力做到遵循教育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规范，独自一人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以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茂县等土族和羌族聚居杂居县及乡村以及当地中小学，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地调研。

土族和羌族在创制文字的时间上都晚于我国其他拥有新创文字的少数民族。在民族语言使用环境日趋缩小的严峻形势下，迫切需要对于土族和羌族语言及其新创文字的使用与发展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作者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在获得大量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试图以教育人类学、民族语言学和经济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分析和理论阐释来重点探讨影响和制约土族和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与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在土族、羌族地区学校教育中不同类型双语教育模式的建构问题,客观地反映了土族和羌族群众目前对于本民族语言和新创文字使用与发展的真实态度。可以说,这种针对土族和羌族新创文字在学校教育领域使用现状的综合调查,在我国还是首次。例如,土族和羌族群众对本民族语言使用的基本情况、语言情感态度与语言行为倾向态度、对本民族新创文字学习、使用及发展前景的态度、对学校教学语言的选择及双语教学的态度等方面的调查结果,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少数民族新创文字使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民族语文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提供对策性意见和建议。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08年5月12日的大地震给具有悠久历史的羌族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县雁门乡、茂县凤仪镇、茂县曲谷乡河西村等地在这次大地震中都遭受了重创,而这些地区正是作者于2006年深入考察,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典型地区。她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羌族语言和新创文字在学校教育领域乃至其他社会领域的使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土族和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的相关研究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作者凭借其坚持不懈的拼搏精神,在今后的后续研究工作中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滕 星

2009年11月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内容提要

当前，在符号化信息社会以及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影响下，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语言及文字前途未卜或濒临消亡。尊重和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使它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并得以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组织等共同关注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仍有大约 6000~7000 种语言，人们估计，至少有一半的语言面临在今后数年中消亡的危险。绝大多数语言没有记载它的系统符号体系——文字，而没有文字的语言几乎全部是少数民族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语并存世界里的教育——教科文组织意见书》一书中指出：“全世界数以百计的语言已经消亡，还有许多语言濒临灭绝；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其他国家和大陆带来了新的和各不相同的语言；因特网极大地改变了语言在交流和学习中的使用方式；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对许多通常以语言划分的小群体的生存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①

面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发展现状，各国采取了多种形式来挽救面临消亡危机的语言和文字。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派遣和邀请大批语言学家去记录这些语言或为这些语言创造文字，而且人们

①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多语并存世界里的教育——教科文组织意见书》，巴黎，2003，(ED-2003/WS/2)。

在探讨已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的使用前景时，普遍把目光和希望集中在双语教育上，即有计划地在学校中使用这些语言，通过教学使这些语言保存下来，因为语言文字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学校教育、传承文化的重要工具。

1955—1991年，国家先后帮助壮、布依、黎、侗、苗、彝、哈尼、傈僳、佤、纳西、载瓦（非族名——编者注）、土、羌共13个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其中苗文4种、哈尼文2种）。^①

对于这些已经具备新创文字的少数民族，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从而达到保护其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弘扬其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这一问题是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教育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重要的研究课题。

党和政府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为聚居于我国青海省的土族及四川省的羌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在我国所有新创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属于文字创制时间最晚的两个民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土族和羌族在其语言和新创文字的使用功能变化等方面都表现出许多新的共性特征。因此，本书将土族和羌族语言及其新创文字的使用情况，特别是在学校教育领域中使用的历史与现状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

土族与羌族由于推广和使用新创文字的时间较短，加之受当前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强烈影响，目前在本民族内部，更多的年轻人广泛使用汉语言文字。在这种民族语言使用环境日趋缩小的形势下，迫切需要对土族和羌族语言及其新创文字的使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

本书以教育人类学、民族语言学和教育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分析和理论阐释，重

^① 金星华主编：《中国民族语文工作》，75～9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点探讨了影响和制约土族和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与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在土族、羌族地区学校教育中不同类型双语教育模式的建构问题,力求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土族和羌族地区的民族语文政策和双语教育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可操作性对策建议。全书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本书研究的背景及选题的价值与意义,介绍了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和新创文字的基本状况,在阐述本研究的方法论的同时附有详细的文献综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土族和羌族的社会历史文化概况,对土族和羌族的人口分布、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使用的概况以及土族和羌族的教育发展概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二章简要回顾了土族和羌族文字创制的过程以及新创文字在学校教育领域试行的情况,分别从语言调查及文字创制的背景、新创文字方案的形成与试行状况、新创文字在学校教育领域的试行情况等几方面进行了介绍。

本文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对土族和羌族实地田野调查的问卷分析。通过发放近 700 份问卷,分别对土族聚居区互助县、杂居区民和县,羌族聚居区茂县、杂居区汶川县等地的中小学教师、学生和聚居杂居村村民的三种问卷,利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了数据统计及分析。分别从语言使用基本情况、语言感情态度与语言行为倾向态度、对本民族新创文字学习、使用及发展前景的态度、对学校教学语言的选择及双语教学的态度等方面对这些问卷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第五章从族际接触与语言变迁、社会政治形势变化、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变化、语言文字的使用人口及分布特点、国家语言文字法规政策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对土族和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通过主位研究访谈法,直接展示了土族和羌族文化负荷者对本民族语言和新创文字的使用与发展、本民族语言与汉语双语教育的各种观点。